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形成背景、思想渊源与实践价值

孔庆志

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市，401331；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形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突飞猛进时代矛盾凸显从而引起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背景下；继承了卢梭、空想社会主义学者以及摩尔根的文明理论；发展经历了雏形初定、内涵积淀，思想成熟三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深刻视角，为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指明了实践方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实践方法。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唯物史观；实践价值

DOI：10.69979/3041-0673.24.7.055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是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深入分析了社会历史，包含了关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理性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文明的合理展望。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但欧洲多国的工人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嗜血逻辑所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是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绕不开的社会背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是在批判继承西方早期文明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尤其是十八世纪思想家关于文明问题的讨论，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对私有制批判，使马克思恩格斯对私有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空想社会主义代表学者欧文、圣西门等为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深入研究人类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深刻视角，为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指明了实践方向。

1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形成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根植于他们坚定的唯物史观，立足所处时代不懈探索人类文明领域，在19世纪大转型时期，新的时代问题形成并凸显，人的生存状况、精神状况和价值选择发生了根本变化。

19世纪的欧洲、北美和日本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弄潮儿，主导了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相传播迅速，让当时的资本主义文明一时风光无两，生产技术的革命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力。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物质文明进步做了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他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时让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新型工业技术，这些技术不仅催生了规模庞大的企业，

还促使人口向广阔的城市区域汇聚。同时，新技术所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如同催化剂，加速了企业间的兼并浪潮，进而孕育了垄断巨头。

资产阶级构建的资本主义帝国深刻改变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内的社会结构，但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危机，马克思是这样评价的：“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全国性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自此之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频繁上演，其影响从单一国家扩散至多个国家，从局部区域扩展至全球。这种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已成为其自身难以治愈的顽疾。

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广大无产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开始了自我意识的觉醒。19世纪法国、英国、德国均爆发了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在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的纺织工人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起义，并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占领城市。从1835年到1843年，英国见证了人民宪章运动的兴起，1836年伦敦工人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工人运动的迅速扩展，英国工人以《人民宪章》为共同的政治纲领，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也爆发了起义，起义核心目标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呼吁废除私有制，显示出更为激进的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给予了这三次运动极高的评价，认为三次起义标志了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2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思想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的思想花朵是在吸收西方传统文

明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孕育并结出果实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前人观点辩证的否定以及合理的扬弃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观。

法国思想家卢梭主张人类源于自然，然而人类所建立的文明却破坏了人的本真天性。他所说的本真天性指的是心灵未经雕琢、未被文明影响的原始状态。在这样的理论支撑下卢梭一方面有力批判了君主专制的法国，坚持反抗旧制度下的“奴役”和“压迫”，寻求建立新社会，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重构中，卢梭指出社会不平等与贫富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同于政治经济学关于贫富问题的分析，卢梭主要是从社会制度、法律以及所有权的方面来呈现私有制是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根源，卢梭指出奴役和贫富分化呼唤着社会制度的变革，但另一方面卢梭又幻想在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上建设起他所谓的“道德政治”，卢梭这种改良性的观点构成了他的第一个“文明悖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到：“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由此可以看出卢梭对不平等问题的思考对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层面的影响。

空想社会主义代表圣西门在他的历史阶段划分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必将被遗弃的人类文明。圣西门对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深感厌恶，他指出当时法国的统治阶级从一开始“就暴露出武力统治的特点和特性”，暴力和警察是资本家统治社会的力量，所谓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新封建制度”是变相的奴隶制度。

罗伯特·欧文是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尤其关注了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他观察到，随着生产力提升，社会分化为富裕的大资本家和贫困工人阶级，从而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差距，欧文对私有财产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44年第一版序言中讲：“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由此不难看出，摩尔根对文明的探讨与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影响。摩尔根在其著作《古代社会》中，以文化演进的顺序为线索，深入研究了从原始

社会到文明社会的演变过程，这一研究路径揭示了人类从蒙昧无知时代到野蛮时代再到文明时代的演进。摩尔根在书中对人类文明发展阶段进行了细致的划分为三个阶段：蒙昧阶段、野蛮阶段、文明阶段，同时前两个阶段又细分为初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低级、中级、高级三种社会形态，其中文明社会单列，共计七个时期，七种形态，“上述的每一期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并呈现出一种多少独具一格的生活方式。”

3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的实践价值

3.1 为人类文明形态演进提供实践导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作用并认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但同时也指出了其内在的局限性。他们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明是狭隘和野蛮的，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文明实际上维护的是少数人的利益，而非大多数人的利益，狭窄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这构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根本局限。同时资本主义文明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终结，而是资本主义旧文明的结束和共产主义新文明的开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文明本质的基础上，阐明了人类文明从低级到高级演进的必然性。然而，他们并不认为所有民族国家的文明发展道路都必须遵循这一演进规律，反对简单地将这一逻辑公式应用于所有民族和国家。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例如，晚年的马克思深入研究了俄国的经济社会结构，揭示了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及其时代背景的特殊性，并认为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直接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成果，进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文明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揭示了共产主义新文明的必然性以及人类走向共产主义文明形态道路的多样性，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中的文明形态演进的规律为当代世界文明形态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导和价值遵循。

3.2 为中国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实践指导

在当前全球格局经历着百年未遇之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全球文明之间的交往亦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度与广度前所未有的拓展，国家间的互动日益突破地理界限。在这一社会变革的浪潮中，中国正基于当前时代的定位，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积极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3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提出：“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

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这完美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有关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典文献中随着各民族和国家生产力及科技水平的提升，原有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世界进入了一个相互依存和普遍交往的新阶段。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逐渐一体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逐渐融入到全球历史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外向扩张，将先进的工业、商业和铁路交通等带入了古老民族和偏远地区，这些地区的生产方式和工业形态因此发生了转变。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逐步建立，人们、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交往需求日益增长，交往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大，最终，原本孤立的单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走向了开放、全面和整体的世界历史，世界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

在全球化高度融合的当代，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中有关对外开放的理论仍具有时代价值，其理论内涵并未因时间流逝而失去时效性，反而愈发显现出其深远的理论意义。该理论对于深化我们对全球化本质的理解、积极地参与并融入国际社会，以及准确预判全球化未来走向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启示。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始终坚持马克思对外开放的理念，持续推动改革与创新。经过多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与探索，中国的对外开放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在中国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3.3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实践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1853年到1858年间曾创作大量经典文献以专门论述彼时中国的境遇和状况，深刻剖析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通过鸦片贸易等经济和军事手段对中国的压迫，同时对中国革命做了深刻分析，看到了中华文明在未来必将复兴的历史趋势。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中明确提到：“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构想为后发国家采取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晚年为了回复查苏利奇关于俄国农业公社发展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摆脱资本主义的劣根性是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核心要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表明了中国要在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避免了资本主义的暴力手段、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

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马克思还强调若俄国意欲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必须抵御外部的破坏性干预，并保持俄国农村公社的公有制特性。同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色彩，这条道路既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又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步脉动。它有效地解决了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并成功抵御了外部力量的侵扰，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05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06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47
- [4] (法) 圣西门. 王燕生等译. 圣西门选集(第三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203
- [5] [美] 摩尔根. 杨东莼等译. 古代社会[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9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93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66
-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59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800
- [10] 秦宣, 尹小恩.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明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机统一[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4, 28(03): 5-17.

作者简介：孔庆志，男，汉族，山东菏泽，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